

陶藝在中國文化之啟示

蘇文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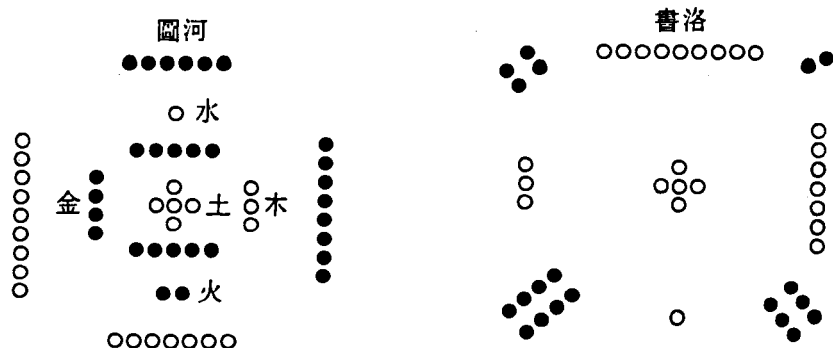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啟示」一詞，是從《聖經》上借用過來的。啟示些甚麼？我們先從《易·繫》一句話說起：「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句話並不含有價值批判。是說盈宇宙之間，都充滿著物質與物體，其中有形的，便是形下之器。有器便有理，則是形上的道。《詩經·烝民》說：「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解釋說：「有是物必有是則。」等於說有那一種「器」，自然有伴著器而來的「道」。當然，所謂物則、物理、物道，可以從科學技術上面去探求。不過，科學技術仍然是屬於形下的功夫，惟有器道結合，纔顯出相輔相成的作用。

在沒有指出陶器上形上的道之前，我們不妨先追溯初民怎樣從勞動生活實踐中創製這種東西。《禮經·禮運》說：「昔者先王未有火化……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炮以燔，以烹以炙。」這幾句話概括而有力地指出陶器之產生，乃先民為著生存而生活，首先使用於飲食工具方面。陶瓷史從西方考古上公認在七、八千年前新石器時代已經出現，人類改造自然，開始踏出了一大步。石器無論怎樣加工雕琢，仍是利用自然，而陶器則是將自然物進行人工配製，正如《易·繫》所說：「作成器以為天下用，莫大乎聖人。」聖人就好比我們現在的科學家、發明家。依史書所記：神農作瓦器（《逸周書》），又作甕、瓶（紀元前 2700 年）。到黃帝時有「陶正」一官專理其事（《史記·三王本紀》），到紀元前 2300 年的帝堯，稱為陶唐氏。他始居陶丘，後封唐侯。陶丘，即今山東省定陶縣。依《說文》解釋「陶」是「再成丘」。「再成」的意思顯然在山坡上構成的陶窑，即《詩經·綿》描述古公亶父的「陶復」。依文字學的發展，先有「匋」而後有「陶」。《說文》：「，作瓦器也。從缶，包省聲。」是個形聲兼會意字。然後加上一個「阜」旁，標識著這個丘陵是製匋的。堯的繼承人帝舜，以農業起家，兼精陶術，《史記》、《新序》等書都說「舜陶於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器，病也，弱也〕」。從帝舜越過一千年，夏、商二代直至周武王時（紀元前 1120 年），虞舜的遠孫虞閼父為周陶正，據《左傳》說：「武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爰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之陳。」胡公是虞閼父的兒子，因為陶業世代專家，獲得駙馬爺的光寵。西周王朝，就那樣承接著堯、舜、夏、商以來長期的陶業生產。周朝設官，便有陶人和甗人（音甫或者放）。《考工記》說：「博埴之工陶甗。」陶人掌一般炊器，甗人負

責祭器，「事神治民」漸已分工，這裏不暇詳說。但有一點非常值得注意。《考工記》說：「凡陶甗之事，髻、壘、薛、暴，不入於市。」「髻」是「刮」的音轉。「壘」是「撼」的音變，即是碰傷。「薛」是「裂」的音假。「暴」是憤起不圓淨之意。這四種器病，正是上文「苦窳」的解釋，而陶器製成，此為病態，相信至今不改。從「不入於市」一句看，似乎已經類似後世工商品出廠檢驗的制度了。

陶器發展史是說不盡的。上文那麼粗略，旨在說明中華民族從有紀錄開始，就是陶器民族。他們生活於黃河流域農業生產的社會，自神農、黃帝、唐虞、夏、商、周，悠悠四千多年，都可說以陶器為生產指標。其生產的量和質，必然有驚人的發展。近百年，單從黃河上、中、下游出土古陶來看，自仰韶文化(紀元前 4515 年)、龍山文化(紀元前 2310 年至紀元前 1810 年)以至大汶口、馬家窑、半坡、齊家……等分佈於上游。甘肅至下游山東，每一朝代，都留下不少出土的東西。十年前，北京文物出版社花了七、八年的時間，集中了陶瓷考古專家，出版了一本《中國陶瓷史》，煌煌巨製，相信是研究陶器必備的書。本人倒萌生兩個看法：第一、中國四大發明，小學生都懂得，我以為可以加入陶瓷成為五大發明。指南針、製紙和火藥、活字印刷都先後經由中亞而入歐洲。陶瓷同樣走絲綢之路，在東漢一世紀時，已向西方輸出了！陶瓷史公認中國瓷器製作，比西方早了一千五百年。其次，「支那」代表中國，傳說是瓷器的意思；但據考據家說：「支那」一語，起於印度人稱呼中國，意即文物之國。蘇曼殊曾經考據過。我以為與其瓷器代中國，不如用陶器更有歷史文化意義。明乎此，陶器藝術不單是供人實用、欣賞，應該有更高的文化層面。這應該從陰陽五行說起，我常覺得，如果不信受陰陽五行學說，就無法了解中國幾千年文化的根源。不少淺學人士，人云亦云，總以為陰陽五行不科學，甚至是迷信的。須知陰陽五行有形而上之道，從而派生了那氣體、液體、固體之器。科技與哲思，最高都結合起來。太極生兩儀，兩儀可以說成陰陽兩種氣體。由此派生五行：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數五，地數五，合而為土。傳世之《河圖洛書》，朱熹把它放在《易經集傳》前面。



一方面是加減乘除的原始，同時是五行的生成編配。你說哲學也好，玄學也好，科學也好，總之沒有這套東西，中華民族進化史就無從寫起。這話說來太長，現在只能配合到陶器上來理解。八世紀唐代韓愈四友之一歐陽詹在《陶器銘》中寫下一句：「易簡二儀之理，利用五行之本。」真是一語中的。二儀不過是一個語文符號，從天地間氣體上看是陰陽，從固體上說是剛柔，所以《繫辭》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在物質原素，便為水火的相對，金木之相對，而皆依土而存。坤為地，為土，正是陶器首要的原料。孔子在《坤卦·文言》中說：「坤至柔而動也剛，……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這裏，我們注意有三點：第一、製作陶器的土，在《禹貢》辨別九州的泥質叫做「壤」，「壤」的訓詁就是「柔土」。青州、兗州有黑壤、白壤，徐州有汴，不一定指空間位置來說，總含有正中、均衡、調和、對稱、穩定等等意思。儒家中庸學說就這樣建立起來。《易經》乾坤二卦的《文言》，都分別提到。《乾·文言》說：「龍德而正中者也。」又說：「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坤·文言》說：「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又說：「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可見於形象為天地，於卦象為乾坤，於二氣為陰陽，於物質為五行，全都可以結合成一個中和性，所以《中庸》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把他運用到人性道德，正如《舜典》所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運用於政治上，《中庸》說：「舜其大智也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運用在教育經驗上，《論語》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所以孔子讚歎「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鄭康成解中庸，說是「中之為用」，顯然比宋儒中庸分作兩義來得合乎語原。在陶器製作，更是貫徹了「中之為用」。《禮記》月令分佈，東木為春，南火為夏，西金為秋，北水為冬，而「中央土」有寄王四時之說。意味著土位於中央，調和四行與四時，而陶器正是以土為主，而水份、火候、金屬、木材之運用，哪一樣不要中和調節呢？無論圓形方形，都要定下一個中心點。在留傳下來的古陶來看，不論是飲食用具和祭器，不論大小高矮，基本上不出方圓二體。先民認為天圓地方，又是大自然規律。不過，我們要知道天圓地方，是從形上之「道」投入形下之「器」。這話怎說？《管子·地員》說：「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又說：「若天圓而地方，是四角之不掩也。」這是說太空性能「圓轉無礙」。而土地性能「方重不遷」，乃是抽象性的圓方，而不是具象上的方圓，這兩種性能正是陶器製作上造形的依據。再把它結合到人文思想，更是一大套學問了！《坤卦·六二爻》說：「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文言》解釋道：「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後來《淮南子》提出「智欲圓而行欲方」。「行方」是厚重不移的坤德，而「智圓」予人以一種洞明事理、隨機應變的圓活性。自古儒家教人方圓並用，《禮記·儒行》說：「儒者毀方而瓦合。」正用陶器來比喻，元朝陳澧《禮記集解》解釋說：「陶瓦之事，其面則圓，剖而為四，其形則方。毀圓以為方，合方而復圓，蓋於涵容之中，仍存分辨之意。」此一段話，可以從《論語》中得到許多印證。我

們在觀賞一件陶器，暫時撇開藝術角度，單從方圓形製上的變化，就會思考出不少人生意義。

現在談談由「虛中」到「容物」。初民製作陶器，起於養生送死。養生方面；莫如飲食用具和食品的儲存；送死方面；莫如赤壤。陝西一帶，厥土惟黃壤。這顯然是構成古陶器中黑陶、白陶、赤陶、黃陶種種原料。屬於至柔之土性，但經過水火金木強烈動感，變成硬挺的陶器，這不是至柔而動也剛嗎？其次，「坤道其順乎」，在倫理學上，自然理解為婦女德性，以柔順為主。但從製陶的物理上看，泥土具有淘汰功能，有延展性、壓縮性，歸於可塑性，最終是陶泥的適應性極強。第三、「含萬物而化光」，這六個字要請製陶專家從化學原料運用上來說明了，例如：石英、鉛粉、鈾鈣，後來釉上五彩之類。所以任何出土之古陶，都有其所含之物，都各有其化學作用所呈現的光或彩。漢代以後瓷器更不用說。所以近代陶瓷史，一致承認古代陶器是人類進入認識化學的第一步。如果再從「利用五行之本」一句來看，相信古代製作過程，五行兼備的，也推陶器。用土、用水、用火，不在話下。《周禮》陶人用「陶鈞」。「鈞」就是圓形旋轉的軸。又說瓶人用「模型」，這是木製的方形陶坯。「鈞」字從金，「模」字從木，都說明了金木的運用。何況最原始的，並不是在土穴中，根本是用木柴地面架構，據說現在雲南省傣族還存在這種遺跡。

二儀五行，經已說明，我們可以再推到人文思想上兩個要點：一、是由定中到方圓。二、是由虛中到容物。

製陶技術之「定中」。一如建築技術上的「定平」。中華民族自古即以「中國」自稱，我們不必以世界地圖或中國地圖來執著這個中字。自古以來，對中的概棺槨與明器，無論哪一種器具，其中愈虛，其容愈大。上文提過，「匋」字從包省，從缶。包固然有容納之義；「缶」，原是汲水器，大小不一，發展而為有虞氏的「泰尊」，顧名思義，是大瓦罇了。再發展而為《考工記》裏面的「甗」。是容納五斗的大尊，《禮記》：「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堊棺。」居然把一個人容納起來了！這道理本來十分平常，然而落到一個哲人的心眼中，又有一番啟示：「虛無」是道家最高的哲理。《老子》說：「虛其心，實其腹。」又說：「致虛極，守靜篤。」虛之極，便是「無」，能虛能無，便能容物。《老子》第十一章說：「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從陶器的虛中容物，悟出「無為為用」的哲理。《莊子·人間世》記顏淵問孔子「心齋坐忘」之法，孔子告以「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虛之為用，有二律背反之理，在自身說來，六祖所說：「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在自他說來，惟內心虛無，可以容納很多東西，東坡論詩說：「欲令詩語妙，無厭虛與靜。靜故了羣動，虛故納萬境。」後來佛家之坐禪，道教的內丹功，瑜珈術的靜坐，無非走向老子虛無境界。至於「虛中容物」，儒家還有兩方面的看法，一是知識上的虛心接受，《荀子·解蔽》指「虛壹而靜」是心理上的「大清明」，他說：「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己所

臧害所將受。」這是說無成見、無主觀，才能客觀地接受新知。其二是用於人事上。《書經·君陳》：「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書經·秦誓》描述一個賢臣，「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容忍就成為在人在事上的傳統美德。我們通常用「胸襟狹窄」、「器量淺小」或者「寬宏大量」、「海量汪涵」來形容兩種相反的人物。都可以從陶器上面體會出來。

從上述兩點看來，中庸是儒家道德的標準，虛無是道家最高的哲理，都可以從形而下之器，聯貫到形而上之道。從唯物到唯心，從自然到人生，也就是學究天人，天人合一的實證。中國傳統文化的啟示，一向都朝這方面去理解。例如：一本《易經》，八八六十四卦，每一卦的大象中，都作如此的說明。從天體運行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從地球深厚指出「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因而，我今天從先民遙遠的陶器製作史上作一番思想上、道德上的啟示，應該是符合中國文化的特徵。陶器也就不止於藝術欣賞，而有其文化教育的意義了！

稿 例

本刊主要登載有關中國語文應用及規範研究、翻譯研究及有關學科學術活動的文章。來稿請以五千字為限，於稿末註明作者真實姓名、職業、通訊地址及電話，以便聯絡。

來稿一經接納，版權即屬本刊所有。未經本刊書面同意，不得在他處發表或另行出版。

請用單面有格稿紙，以正楷橫寫。

古文字、罕用字、外文、音標等，務請謄錄清楚。

統一用公元紀年。帝王年號後，請附註公元。

引文務請自行核實，並註出處。譯文請附原文。

本刊編輯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註明。

合用或不合用的稿件，均於三個月以內回覆作者。

來稿刊登後，當致送薄酬，另平郵寄贈當期刊物五冊。

來稿請寄：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